



# 胜利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 ·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 胜利的困境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 香港中文大学 2011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  
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  
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 978-962-996-470-2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图文传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电子邮箱：cup@cuhk.edu.hk

网 址：www.chineseupress.com

封面图片：

Sam Tata 摄 “高跷上的游行者” (*Parade Participants on Stilts*)

加拿大国家美术馆藏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Translated by Yao Yu, with Chen Zhihong, Guo Youxin, Yang Jingxia, Sun Xiaoping, Wan Yuancho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470-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Cover Image: *Parade Participants on Stilts*

Artist: Sam Tat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from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编

姚昱 等译

**纪念魏斐德**  
**我们的同事、导师和朋友**

## 致谢

对我们这些在北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让广大中国读者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本书中文版的诞生得益于杨奎松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我们对杨奎松教授、韩钢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班的全体师生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支持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与中文大学出版社合作的整个过程非常愉快和顺利。为此，我们要特别感谢甘琦社长、吴永熹编辑以及林颖编辑。我们还要对姚昱等人细致的翻译工作，林一苹细心的译校工作和刘宪阁仔细的校对工作表示感谢。此外，我们要感谢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s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Fund）对翻译和校对费用的财政支持。

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岁月：重新回顾 1949–1953 年的转变时期”这一学术会议的产物。该次会议于 2004 年 6 月 20–30 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召开。我们要感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下列机构对此次会议所提供的财政支持：负责学术事务的资深副校长办公室，人文科学中心，徐氏中国研究基金，中国研究项目，东亚研究委员会与历史系。

除了本论文集的作者们之外，还有一些杰出的学者们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要感谢洪堡州立大学（Humboldt State University）的罗伯特·克里沃（Robert Cliver）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徐兰君，他们不仅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会上还扮演了极具洞见的讨论者的角色。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几位博士研究生在会议期间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援。莫捷明（Jeremy Murray）是会议的记录员，何必（Brent Haas）、黄爱伦（Ellen Huang），何大鹏（Dahpon David Ho），蒋迈（Matthew Johnson），

张珺 (Elya J. Zhang), 郑小威 (Xiaowei Zheng) 对会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后勤支持。加州大学中国研究项目的两位职员贝蒂·冈德森 (Betty Gunderson) 与朱莉娅·关 (Julia Kwan) 对会议的日程安排、信息交流与文稿准备也贡献良多。

我们也希望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凯瑟琳·麦克德莫特 (Kathleen McDermott) 为此书英文版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以及苏珊·巴杰 (Susan Badger) 这位能力出众的责任编辑的工作。我们还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的匿名评审人为本书提出的诸多有用的评价与建议。

我们的老同事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启迪了許多人。他为人热情慷慨, 是本次会议的主导者之一, 魏斐德的文章也为本书其他部分确定了基调。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 我们将《胜利的困境》敬献给魏斐德, 这位伟大的学者与令人尊敬的朋友。

# 目录

致谢.....	ix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论 .....	1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一、城市接管.....	21
2. “清理整顿”：上海的新秩序 .....	23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3. 国家的主人？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上海工人 .....	63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4. 新民主主义与上海私人慈善的终结 .....	83
温奈良 (Nara Dillon)	
二、占领外围.....	107
5. 从反共到抗美：1950—1951 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 .....	109
周杰荣 (Jeremy Brown)	
6. 西藏的“解放”——发生于 1949—1951 年的一段历史 .....	137
陈兼 (Chen Jian)	
7. 老大哥在盯着：1945—1955 年中苏地方关系与新大连的建设 .....	165
何凯思 (Christian A. Hess)	
8. 绿洲的召唤：1949—1953 年的新疆“和平解放” .....	191
高崢 (James Z. Gao)	



三、适应环境变迁的文化.....	215
9. 鳄鱼鸟：1950 年代初期的相声.....	217
林培瑞 (Perry Link)	
10. “第一堂课”：1950 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	243
舒喜乐 (Sigrid Schmalzer)	
11. 像革命者一样演戏：1949–1952 年间的石挥、文华影业公司和私营电 影制片厂.....	271
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12.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新式正规大学”：1949–1950 年.....	303
李滨 (Douglas A. Stiffler)	
四、家族策略.....	325
13. 叶氏兄弟在新中国.....	327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14. 接生的故事：1950 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婆.....	351
贺萧 (Gail Hershatter)	
15. 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家：1948–1956 年的上海刘氏家族.....	375
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	
撰稿人简介.....	401
索引.....	405

## 第一章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引论

周杰荣 (Jeremy Brown)、毕克伟 (Paul G. Pickowicz)

自从 1953 年以来，即当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毛泽东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之后，中国 1950 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就从人们的观察视野中消失了。出现这一情况不足为奇。随着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解释中国一系列新的戏剧性事件，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谁还会对紧接着 1949 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的这个时期感兴趣？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只是一个过渡，它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剧变之间的关联，还鲜为人所知。

中国官员与学者中的许多人都在 1953 年以后的各种运动中受到了打击。他们对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的讨论要比西方同行做得早。在官方的历史著作中，1950 年代初期被展示成一个“黄金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社会和谐。<sup>1</sup>增进团结的确是 1950 年代初期党的官方政策。毛的新民主主义原则承诺过，要把与革命的“工农联盟”并不那么协调的资本家和其他中国人也包括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在毛时代之后的改革时期，各种出版物都开始宣扬对 1950 年代初期的正面记忆，这一点并非巧合，因为这两个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49 年 10 月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私人工厂与大型国有企业并存，非政府组织和教会组织几乎与中共领导的组织一样起作用，而资本家与其他党外人士则支持当局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情形，在 1970 年代下半期毛泽东去世之后再次出现。

然而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期的人都知道，2001年远非1951年。1950年代初，中国正在从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内战与自然灾害中获得新生。管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多变、支离破碎又贫穷不堪的国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对于一个此前二十年一直活动在内地的政党来说更是如此。掌权之后，共产党马上又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到1950年末，人民共和国不仅对外在朝鲜对美国作战，而且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武装反抗时有发生，很多地区只是在名义上为共产党所控制。但是，人民共和国初期的这个阶段，也是一段充满希望与热情的时刻。大量的新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共试图将社会各阶层包括进来。在城市，资产阶级成员既被期待改造自己并为国家的更高福祉牺牲自身的利益，也被邀请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贡献力量。然而在农村，地主作为的空间很小，特别是从1950年末温和的土改政策让位于更加暴力的阶级斗争以后。<sup>2</sup>

1950年代初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向我们暗示了当时的挑战、疑虑、希望与恐惧。到了1953年，大多数西方记者、留学生与神职人员都已经离开中国。但是就在四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目睹了中共接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场面。他们对新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从同情中共到极端反共的都有。但所有人都关心这一问题：共产党是否已经彻底地赢得了内战，抑或1949年的胜利者仅仅是填补了国民党人垮台后所留下的政治真空？

当时第一手的记述证实，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已经为改变做好了准备。知识分子、学生与其他人虽不一定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但对1948与1949年开进中国东部城市的这支纪律严明的农民军队都表示热情欢迎。<sup>3</sup>不过在这些最初的报道中，对中共的潜在担心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点尤其体现在那些有关新政权在1950年与1951年致力于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和镇压“反革命”的方式来清理与重塑社会的文章里。<sup>4</sup>

学者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苏联导演的一场国际大阴谋中的马前卒这一点，也莫衷一是。这个党虽然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长达十多年，但是外部世界对此知之甚少。而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

“红色恐慌”（Red Scare）使它倾向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服从莫斯科的指令的。中国的确在 1950 年代与苏联合作过，但它也是在走自己的民族主义道路。对毛来说，苏联的支持也许帮助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人民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才“站起来”的。不过关于中国公民与苏联专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的情况，其细节到现在人们还知之甚少。

对于那些倾向于谴责新中国是一个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集权”社会的人来说，中共政权使用暴力与强制手段，为他们提供了口实。最早关于 1950 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多半以情报和中国报纸译文为原始资料，它们将中国描述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这些著作断定，大多数中国人正过着一种“恐惧而麻木的生活”，而国家恐怖已经“把中国人可能有过的抵抗意志消磨殆尽”。<sup>5</sup>

虽然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研究延续着这种“认识敌人”的意图，但是就中国领导人是否盲目执行苏联命令这一问题仍有分歧。例如艾伦·怀廷（Allen Whiting）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介入朝鲜战争，是它面对自身的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而做出的反应，而不是苏联阴谋的一部分。<sup>6</sup>即使在冷战背景下，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但是由于资料的局限与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所限，朝鲜战争对中国国内的重要影响，仍然没有被披露出来。

其他以个人经历或对香港的大陆流亡者的采访为基础写成的著作认为，中国新的领导人的兴趣不仅限于国家安全、政治控制与经济现代化。革命看起来也发生在个人的、心理的、甚至是精神的层面。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的《思想改造与集权主义的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与李克（Allyn Rickett）和李又安（Adele Rickett）的《解放的囚徒》（*Prisoners of Liberation*）（此书为两个在中国监狱里经历过思想改造并转而支持中共政权的美国人的回忆录）显示，中国采取的并不是那种不加区别地杀戮潜在敌人的制度，而是通过承诺给予灵魂拯救来换取一些人对新政权的完全服从。<sup>7</sup>

总的来说，1950 年代完成的回忆录与学术著作都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利用民众要求改变的热情，再加上恐怖和灌输，已经稳固了权力。但是只靠对逃亡者的采访和报纸的报导，也在研究中留下了许多无法回答

的问题。必然地，这些探讨基本上都聚焦在新政权力量集中的大城市，多半高估了党对社会的控制，无法说清 1950 年 80% 以上还是农村的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事件。<sup>8</sup> 中国各地在同一时期经历了同一过程吗？1950 年代初期的种种变化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了村民与市民、男人与女人、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吗？人们对家庭、乡土和职业的忠诚全都消失了吗？

到 1960 和 1970 年代，经过新一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毕业生与年轻学者的努力，这些问题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新的著作注意到人民共和国初期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旧（传统中国文化）和新（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平衡。在第二波研究 1950 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成果中，出现了这样几个趋势：第一，资料的限制意味着学者们仍不得不更多关注政党—国家层次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而不是地方社会的运作；第二，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尝试解释中共的政策是如何被执行的，而不是这些政策是怎样为人们所感受的；第三，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学者们对中国内部在整个 1950 年代一直存在的各种冲突与隔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sup>9</sup>

在文化大革命动摇了中国是由一个统一的党领导的团结社会这一印象之前，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详细介绍了中共通过列宁主义式的组织与制度管理中国社会的情况。<sup>10</sup> 舒尔曼认为，党一国在 1950 年代已经消灭了传统的权威网络，并取而代之。但是，当其他社会科学家继续密切观察单个的省份或城市时却发现，旧的模式与隔阂并未消失。即使对共产党干部来说，1950 年代初期他们与家庭和家乡的纽带，也是与对国家和党的忠诚并存的。傅高义（Ezra Vogel）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揭示了当地人与外地人在广东省的摩擦。多年来一直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本地干部，十分不愿执行 1949 年大批进入该省的北方人所发布的命令。当外来干部批评并取消了广东省当地温和的土改措施时，这一关系就更加恶化了。<sup>11</sup> 傅高义发现，即使同在广东省，这些干部们在语言上以及观点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 1950 年代初期的中共党组织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画面。

文化大革命为中共党组织及中国整个社会内部存在着各种隔阂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学者们发现，基本政策的分歧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研究天津时，就注意到毛泽东采取的是群众动员的管理模式，而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支持的则是党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sup>12</sup>1949年春，刘少奇访问天津并发表讲话，反对进行激进革命和敌视城市社会上层。在刘少奇访问之后的三年内，天津的干部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与宽容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与宣传并未触动太多的城市居民，只有个别目标群体，如“反革命分子”和宗教秘密会社的成员，感受到了党的统治的铁腕。李侃如揭示出，是朝鲜战争与1952、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最终使中共收紧了对城市的控制，并引发了“第二次革命”。因此，这些转折点的意义甚至比1949年的接管还要重要。不过，个人在1950年代初期的这些运动中究竟有怎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仍所知甚少。

在中国大陆不向外国的研究者开放的情况下，只靠报纸的报导与流亡者的证词，自然限制了有关1950年代初期这段历史的研究范围。这一局面在毛死后有了改变。新资料的获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毛时代的看法。从1970年代末开始，尽管经常会有政府的监督人员在现场，但外国学者的确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采访了。再到后来，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与个人谈论其过去不仅已成为可能，而且是越来越普遍了。虽然中国各地的档案利用与收藏情况有很大差别，但是总的来说，相比以后的那些时期，中国档案馆一直更愿意提供1950年代初期的档案与报告。例如，县一级的档案馆已经允许学者利用显示诸如农村妇女如何靠1950年的婚姻法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资料了。<sup>13</sup>而市级档案馆的档案则能提供共产党接管城市机构、重建城市社会秩序情况的更多细节。<sup>14</sup>

近来官方出版物也提供了关于1950年代初期政治领域，特别是精英层面的丰富细节。许多这类著作仍然致力于宣传“解放”之后的“黄金时代”，但也常常会提供许多有关消灭“反革命分子”与反共“匪徒”的细节资料。<sup>15</sup>新的材料也为认识毛泽东外交政策的革命性与民族主义特点，包括他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带来突破性的进展。<sup>16</sup>

随着资料基础的改变，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毛死后阶级斗争被摒弃，许多学者不再从革命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共和国了。将革命放在次要的位置，转而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的渐进性过程这一角度来思考二十世纪的中国，使得学者们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从这一视角出发，1949年不再是一个僵硬的分界线。柯伟林（William Kirby）关于中国技术官僚的开拓性研究，推动许多新的著作开始探讨家庭组织与工作场所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sup>17</sup> 研究者发现当共产党人开始治理大陆时，出于必要性与策略的考虑，会允许1949年前的组织制度、个人关系与社会模式继续在新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书各章都建立在跨越1949年这一历史分界线的研究构想之上，并努力试图深化相关的认识。在诸如城市政策、公共安全、工业发展、教育问题、劳工关系、少数民族、农村医疗等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在1950年代的行动与国民党人在1930和1940年代的行动非常相似。和国民党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决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即便这种加速了的国家建设削弱了一些社会群体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也在所不惜。因此，即使中共自称是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但1949年春天之后，它还是立刻对劳工运动采取了严格的国家控制。这和国民党当年的举动几乎一模一样。不过无论在风格、手段还是结果上，中共与国民党都有着相当的不同。正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第二章注意到的：“当面临动员问题时，国民党人的方式是进行规劝、向上传达命令、驱策被动的群众，而中共的特性则是直接深入到基层或草根层面并在那里进行组织，号召‘群众’积极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1950年代初期中共深入到草根阶层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是中共动员的对象“群众”？这些群众如何面对因中共胜利而带来的这一困境？甚至，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奇怪，答案是复杂的。本书研究的并非精英政治，而是要探讨不同背景的人在与革命性的政党—国家的中低层代表进行互动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与邓小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接下来的十四章中也会偶尔出现，但更常见的是像副市长、大学校长、部队连长与妇联

代表这样的人物。换言之，读者将要熟悉的是许多负责在基层执行毛泽东命令的无名人士。在 1950 年代初期，这些中低层官员对于农村妇女、富裕商人、电影明星、科学家、一家之主、喜剧演员和战犯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其重要性远比毛泽东更甚。他们这些普通人，将是本书的主角。

本论文集主要打算描述个人、家庭与社会群体究竟怎样经历了 1949 到 1953 年这个时期，特别是这种经历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必须承认，要将 195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进行一般的归纳和概括是不太明智的。以前的研究为这一时期提供了有用的勾勒：1949 年是相对迅速的军事接管，中共起初对城市各社会群体采取了包容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政策收紧并进行严厉镇压，接着是中共巩固城乡控制的土地改革与三反五反等运动，最后是 1953 年开始的转向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重新评估，揭示了相对于上述概括模式，存在着诸多令人吃惊的变异与例外。一个人在 1950 年代早期会有怎样的经历，既取决于他所处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地位，也有赖于他所面临的时代与机遇。例如，对贵州的军事接管并不顺利，直到 1951 年才最终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对上海的慈善领袖和声名显赫的资本家来说，的确是震动巨大、足以改变其生命轨迹的事件；但对陕西的农村妇女来说却毫无意义，对她们影响最大的是接生术的变化。

1950 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对和平的“蜜月期”，还是一场灾难来临前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言而无信、希望破灭的时代？上述多样性使这一问题不太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们，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在沈阳，对一个飞速发展的省级高干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一段黄金时期。而在 1951 年，驻守新疆的士兵们则享受着名符其实的蜜月，当时部队正安排毫无疑问的湖南女孩来给他们做妻子。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在第九章所披露的，一些电影影星、相声演员与慈善家热切地希望与新政权合作，但对“即将遭受的突然打击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将会看到，当取得一系列成功的中共打算清除潜在的敌人、取消难以接受的讽刺作品以及肃清意识形态上不正确的科学观点时，对这些群体的沉重打击突然接踵而来。



为完成特定任务而调动各种资源并集中全力行动，此时中共往往是很有效率的。1950年代初期，新政权的各种举措令人眼花缭乱，忽而令人敬畏，忽而又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中共自己决定了哪些事具有优先重要性，哪些事则不那么急需处理。占领像上海这样的关键城市，恢复东北的工业生产，说服富有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钱）留在中国大陆，确保西藏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些都是亟待处理、最具优先意义的任务。为保证上述事业的成功，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共产党看起来的确像一股组织良好的革命力量。相反，对一些不那么紧迫的任务，中共则表现得拖拖拉拉、视若无睹，甚至笨拙不堪。例如，在占领贵州、整顿上海劳工积极分子的历史问题、允许发行好莱坞电影与创世论小册子这些问题上，新政权的马虎甚至是无能，令人惊讶。1951年以前，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在1949年和1950年“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社会经常占了上风。

与以往有关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研究不同，本书的考察不仅局限于中国沿海城市地区，也探讨了中共对非汉族地区的接管。正如本文集中研究贵州、西藏与新疆的各章所展现的，1949年以前中共是愿意考虑让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的。然而一旦胜利在望，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定义就变得僵化强硬起来，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华民国的——有意思的是还有大清帝国时期的一疆界。在强硬的军事手腕与灵活的外交策略的交互作用下，人民解放军于1951年底占领了西藏。而控制新疆则是一个更为混乱的过程，不仅斯大林介入其中，毛泽东还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每个案例中，中共高层领导人都认为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开化程度较低。他们与这些少数民族打交道时或许谨慎小心，但毫无敬意。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与他们之前的国民党人非常相似。

尽管人们对斯大林在把新疆归还给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的角色已有所认识，但毛泽东与这位苏联独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人熟知。本论文集并不囿于中苏之间的高层联系和“模仿苏联模式”的简单概括，而是从新的角度探究了1950年代的中苏合作与冲突。<sup>18</sup>在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被苏联占领的港口城市大连，以及在进化论